

清代甘肃学校教育研究

张可辉撰

分类号:

密级:

兰州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中文) 清代甘肃学校教育研究

论文题目(外文) Study on Qing Dynasty's Education of Gansu

研究生姓名 张可辉

学 科、专 业 历史学 中国古代史

研 究 方 向 中国古代文化史

学 位 级 别 硕 士

导师姓名、职称 吴章山 副教授

论 文 工 作

起 止 年 月 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4 月

论文提交日期 2002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2 年 5 月

学位授予日期

校址: 甘肃省兰州市

内 容 提 要

甘肃地方教育内容比较丰富、特色明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对清代甘肃地方学校教育进一步研究,加强了量化分析与地理分布的考察,力求有所进步。

本文分六个部分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了相关课题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论述了清代甘肃府、州、县学教育;第三部分,论述清代甘肃书院教育;第四部分,论述清代甘肃蒙学教育;第五部分,论述清代甘肃新式学堂教育;第六部分,探讨了清代甘肃地方学校教育的得失,对清代甘肃地方学校教育进行进一步整体的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 清代 甘肃 学校教育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ansu, Education

258

Abstract

In regard to the local education of Gansu province, the content is plentiful and the feature is obvious. Ba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other scholars,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study further the local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s Gansu, and manage to make some progress by enhancing the analysis in the quantity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geography distribution.

This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ed subjects of this dissertation. In the second part,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official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s Gansu.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Gansu's academy of Qing dynasty. 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foundational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s Gansu. Modern style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s Gansu is discussed in the fifth part. The final part settles the local educational gain and loss and proceeds further cognition of the local education of Qing dynasty's Gansu.

Key Words: Qing dynasty; Gansu; Education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府、州、县学教育	6
一、地方学制与取士制度在甘肃的实施与影响	6
二、府、州、县学的发展、管理及其影响	8
第三章 书院教育	12
一、书院的兴起、发展及其背景	12
二、书院的教育管理与成效	17
三、书院的经费管理与成效	21
第四章 蒙学教育	24
一、义学	24
二、社学	27
三、私塾	31
第五章 新式学堂教育	34
一、传统学校教育的衰败、一度复兴及其原因	34
二、近代新学制在甘肃的实施及其影响	38
三、新式学堂的发展与历史意义	42
第六章 结语	50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引言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①班固《白虎通义》指出这是教育的内容，说：“钻燧取火，教民熟食。”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教育逐渐从社会生产与其它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学校逐渐产生。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比较完备的教育制度逐渐形成，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掌握了某些教育规律，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甘肃地处西北，经济相对落后，其教育是不是也很落后？又是如何进行教育建设和发展的呢？有什么成绩？相关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在甘肃地区是如何进行贯彻与体现的？据张维先生的《甘肃人物志》记载，甘肃历史上也是人才辈出，他们那时又是如何接受文化知识的传播的？带着诸多问题，我渴望了解一下甘肃的教育状况。最后，我之所以选择“清代甘肃^②学校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甘肃地方教育内容丰富，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和必要。

汉武帝时推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天下郡国皆立学官”^③，光武帝时，任延拜武威太守，“选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校受业”^④。甘肃境内设置了学官，为后来历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长期混战，文化教育受到摧残，而今甘肃境内相对安定，经济不断发展。“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中原章句之

^① 韩非子：《五蠹》，见王焕镳选注《韩非子选》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

^② 据郭厚安、陈守忠主编《甘肃古代史》所说，有明一代，在甘肃没有省的建制，而是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和陕西行都指挥司。清朝初年，甘肃行政建制仍沿袭明朝，历康熙乾隆而不断变化。至鸦片战争前，甘肃省所辖有兰州、平凉等九府，泾州、阶州等六个直隶州，辖区除今甘肃外，还包括今宁夏、青海以及新疆的部分地区。本文论述仅限于今甘肃之政区。

^③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④ 《后汉书》卷七六，《任延传》。

儒业，自此之后逐渐向西北转移”，这不仅使甘肃地区的文教事业得到发展，而且其余风泽及北魏，“上继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先启后，继绝扶衰”^①。

“甘郡自汉晋以来，即富方谷，如窦融上书，蒙迹下令，彬雅堪诵，文教早已蔚兴。唐贞观中，敕天下郡国皆建学校，而于甘无考”^②。这当是唐朝学校制度完备，各府、州、县地方政府均完全执行中央敕令所致。科举考试制度的最终确立，使甘肃地方学校教育体系趋于完善且于唐全国教育体系融于一体。两宋以降，元明以来，程朱理学逐渐成为教育理论，特别是明朝实行八股取士，把教育同科举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逐步建立、健全了府、州、县儒学和书院制度，地方学校比较发达。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谕中书省臣：“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③洪武七年（1374年），徽州知州金坚在甘肃首先创建州学，^④尔后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学校。教育制度在甘肃地区的实施先后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变化，至清代逐渐走向成熟。通过对这一相关内容的考证、论述，或可探讨其中的得失，服务于当今的教育改革实践。

第二，从甘肃教育的发展来看，自先秦至清末，历经汉唐宋元明诸朝，学校的类型不断多样化，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社学、私塾、近代新式学堂教育等类型的学校在清代今甘肃地区均有设立。通过对清代甘肃教育的梳理，可以探讨更多种类型的学校的特点和经验，研究更多种类型学校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规律。

第三，从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来看，依办学主体分，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寺院经堂教育、外国教会学校教育等类型；依接受教育的对象分，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

^② 乾隆《甘州府志》卷七，《学校源流表》。

^③ 《明实录·附录·太祖宝训》卷一，《学校》，洪武二年十月辛巳。

^④ 嘉靖《徽郡志》卷六，《学校》，抄本。

有汉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依教育内容来分，有儒学教育、宗教教育、近代科技实业教育等类型；依办学模式来分，有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社学、私塾、近代留学教育等类型。本文的学校教育研究，就范围来讲，包括传统的府州县学、书院、各民族义学、社学、私塾教育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代新式学堂教育，内容涉及传统儒学教育、近代科技实业教育。从历史的角度对学校教育进行考察，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过去某一朝代或某一地区的教育概况。伊期兰教经堂教育、藏族寺院教育是甘肃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朱解琳、周润年对此有过论述。据刘尔忻《果斋别集》介绍，光绪四年（1878年）起，甘肃各地陆续建立了教会学校。王劲、杨红伟曾考述，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对近代甘肃文教、经济有过很大贡献。本文不再对上述各类教育展开论述。

第四，把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探讨和研究是比较晚的，1905年黄绍箕写了一本《中国教育史》，算是最早的。近年来，研究甘肃地方教育的工作一直未断，取得的成果不小：

王烜先生编纂的《甘肃书院史稿》^①是民国以来较早研究甘肃地方教育的论著。朱解琳所著《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②，周润年、刘鸿记合著的《中国藏族寺院教育》^③详细论述了古代甘肃少数民族的教育状况。宋捷、王桂洁编著的《甘肃幼儿教育简史》^④则对清末蒙学、女子小学堂教育以来的甘肃教育状况进行了论述。陆润林编著的《兰州大学校史》^⑤对于完善甘肃教育发展的研究亦多有贡献。另外，《甘肃省新通志》、《甘肃通志稿》、由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甘肃省志·教育志》^⑥、兰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兰州市志·教育志》^⑦等一批新、旧地方志，以及《甘肃教育史志资料辑》则对有关甘肃的教育发展概况的资料进行了

① 甘肃省图书馆藏，1928年稿本。

②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3 年出版。

③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8 年出版。

④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0 年出版。

⑤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0 年出版。

⑥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1 年出版。

⑦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汇编。

蒋制心的《浅谈清代甘肃兰州的书院》^①、王迎喜的《简谈清代甘肃的书院》^②、王励勤的《兰山书院及其他》^③、漆子扬的《古代甘肃书院考》^④及《科举、书院与陇右学术》^⑤、吕熹虎的《临夏书院的创建、发展、废止及其历史功绩》^⑥、邓明的《“甘州书院义学章程”述略》^⑦、黄岳年的《明清时期张掖的书院》^⑧等论文从各个侧面论述了甘肃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书院教育情况，在资料上有一定的发掘，立论上也有所发明。王劲的《晚清甘肃学者任其昌》^⑨、丁焕章、吴永涛的《近代维新教育家刘光蕡思想述评》^⑩通过对人物的论述，给我们展现了当时当地的教育概貌。朱解琳的《甘肃藏族教育史略》^⑪则对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王劲、杨红伟的：《近代甘肃的“留学生”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⑫、孟非的《甘肃近代学校教育纪事》^⑬、张海鹰的《清末甘肃兴学述略》^⑭、杨红伟的《“留学生”与近代甘肃文教事业》^⑮、赵艳林的《清末民初甘肃的职业技术教育及其对专门人才的开发》^⑯及《清末甘肃教育改革述论》^⑰等论文则从多个角度，就近代以来甘肃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展开了讨论。赵世英的《甘肃科举概述》^⑱、宋法仁的《兰

① 《兰州学刊》，1981年第1期。

② 《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

③ 郭厚安等编《悠久的甘肃历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④ 《西北史地》，1994年第4期。

⑤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3期。

⑥ 《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

⑦ 王国华主编《金张掖风情》，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⑧ 王国华主编《金张掖风情》，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⑨ 《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⑩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增刊总第18期。

⑪ 《甘肃民族研究》，1984年第3-4期。

⑫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3期。

⑬ 《兰州学刊》，1985年第5期。

⑭ 《西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

⑮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

⑯ 《开发研究》，1990年第5期。

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第一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⑱ 《甘肃文史》，1992年第8期。

州古代教育史话》^①则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地论述了甘肃全省或某一地区的教育。

前人对甘肃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建设,形成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教育资料,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开辟了道路,但尚未有系统地论述甘肃学校教育的作品出现。基于此,我以“清代甘肃学校教育”为切入点进行论述,以期能为完善甘肃教育史研究添一块砖石。

清初沿袭明制,甘肃大部分府、州、县相继建立了儒学和书院,并在乡镇建社学、义学,作为城市儒学、书院的补充。同治、光绪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封建教化,大力振兴甘肃的传统学校教育,兴办书院、义学,刊刻发行经籍,奏准陕甘分闱,创建甘肃贡院,注意技术教育,曾使甘肃教育有过几分起色。清代末期儒学和书院在战乱中逐渐废弃,新式学堂逐渐兴起并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清代地方学校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府、州、县诸学,一般统称儒学。二、蒙学。传统官学制度中,一般不包括蒙学,而多由民间承担。清代蒙学可分为:(1)义学,由地方宗族公立。(2)社学,多是官办与民办相结合。(3)民间自办私立的,多称私塾。蒙学在当时影响较大,它不仅是一般士子科举的预备学校,也是基础教育之所。三、书院,一种特殊形式的学校,有官立,也有私立,一般分省、道、府、州、县(厅)诸级。四、新式学堂教育。

^①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

第二章 府、州、县学教育

一、地方学制与取士制度在甘肃的实施与影响

地方学制是指中央政府规定的京城以外的各级地方政府办学的制度，其实质是国家统一学制在地方上的实施。西汉以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教育制度。到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兴太学以养士”的文教政策，“立五经博士，置弟子员”。^①从此，封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教育制度逐渐形成：建立了学校系统；确定《诗》、《书》、《易》、《礼》、以及《春秋》五经为主要教育内容；规定了选举取士制度。

明代设府、州、县学之制，“有清学校，向沿明制”^②，地方学校亦为府、州、县、卫诸学，统名为儒学，“凡学皆设学官以课士，府曰教授，州曰学正，县曰教谕，凡生员有廩膳生、增广生、附生，各视其大中小学以为额。简学政以董教事。岁试、科试各别其文之等以赏罚而劝惩之，取其童生之优者以入学”，教育管理较规范。顺治七年诏命礼部：“训督士子，凡理学、道德、经济、典故等书，务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③清初学校的教学内容尚还丰富，同时把培养官员当作其第一宗旨。

选举取士，两汉始立，分“贤良方正”和“孝廉秀才”两科。隋唐创行科举取士，设明经、进士等六科。明朝科举制度完备细密，科目只设进士一科，规定“三年大比”制度，考试采用八股文体，答卷密封编号，分郡试、乡试、会试、殿试，各地严格按此程序选贡。清朝的科举仿明制，更为繁复周密，与府、州、县学联系异常密切，清朝生员的一般出路即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童生通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入学；而后通过岁考和科考，参加科举考试。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每三年举行一次（见表1）。

^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

^② 《清史稿》卷一百六，《选举志一》。

^③ 《清会典》卷三六六，《礼部七七·学校》。

表1: 清代地方学校建制、取士制度

学校类别	学 生			教 师			科 举 取 士	学 科	考 试	待 遇	奖 惩
	廪生	增生	附生	教授	学正	训导					
府学	40	40	若干	1		无定	一年一贡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	岁考每年进行一次，科考隔年进行一次，由学政主试。	廪膳生由政府发给膳食费；一般学生免自身徭役，家贫者在学田租内予以经济。	学政会同该教官举事，生优劣事迹，送学部复核，优生予以升级奖励，劣生除名。
州学	30	30	若干		1	无定	三年两贡				
县学	20	20	若干			无定	二年一贡				
卫学	10	10	若干			无定	1				

当时甘肃各府、州、县(卫)按规定设立儒学，清朝的地方学制在甘肃得到全面实施，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有出入。清代府、州、县学生员“学额多寡视文风盛衰，州县各有额，府学由州县拨充如其额而止。故于文风较优州县多取人数以备拨府。惟直隶州则自有学额不由县拨充也。大抵府学额廪生四十缺，增生四十缺……兰州府学额廪生二十缺、增生二十缺，皆二年一贡，惟狄道州三年二贡；河州廪生、增生各二十八缺，亦三年二贡……平凉府属平凉、华亭、隆德三县，学额廪生、增生各二十缺，皆二年一贡”^①，基本上是按中央所定来制定学额的。

有清一代，今甘肃地盘共考中进士301人，计顺治朝7人、康熙朝16人、雍正朝12人、乾隆朝30人、嘉庆朝36人、道光朝41人、咸丰朝28人、同治朝21人、光绪朝110人，比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省都低，仅高于辽东。^②在科举时代，进士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同是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学术发展的状况。由于面积、人口的差异，从每省进士的绝对值还不能甄别各地文风的高下，但甘肃平均每县5个人，远远低于当时的每县平均值数16人。^③

清代甘肃科举之所以呈现相对落后局面，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的：

^① 民国《甘肃通志稿》，《教育·学制》，甘肃省图书馆1964年油印本。

^② 据朱保炯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一) 甘肃地方学校按朝廷统一规定贡举考选，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必须是乡试的举人，而乡试从明代起就与陕西合闱。康熙二年（1663年）甘肃从陕西划出，独立成省，但甘肃乡试仍与陕西合闱，考试的贡院远在西安，甘肃诸生因路途遥远，开销大，有财力赴试者至多只有十分之二、三。

(二) 陕甘乡试合闱时乡试中额共 62 名，甘肃仅占 10 名，分给甘肃的名额明显偏低，不少人才遭致埋没，能考中举人者更少。光绪朝，甘肃进士增加许多，跟当时政府扩大名额，陕甘分闱有极大关系。关于此，笔者将在下一段中再详加论述。

(三) 甘肃科举的落后也反映出当时甘肃教育是欠发达的。乾嘉时期，甘肃中进士较多，这跟当时经济较发达，社会较稳定，并由此而带来的教育的进步有关。

二、府、州、县学的发展、管理及其影响

陕甘乡试合闱时，甘肃士子不便于应试，而且甘肃中额偏低，不利于甘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同治十一年（1872年）元月，左宗棠奏准陕甘两省分闱乡试，并奏准将甘肃乡试每科中额定为四十名，经部议驳，只准三十名。光绪二年（1876年）乡试，左宗棠奏准再加十名。^①从此，甘肃乡试每科中额为四十名永为定制。光绪二年五月（1876年6月），左宗棠为了统筹全省教育事务，还奏请清政府在甘肃单独设置学政官署，并请清廷委派许应騄为甘肃学政，专承兴复全省文化教育之责，甘肃才有了独立的学政公署。至此，除阶州、肃州、安西州等直隶州因太遥远，岁科二试仍合并举行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秦州直隶州、泾州直隶州都分别举行岁科两试。^②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又在兰州城海家滩（今兰医二院）创建贡院，由兰州进士曹炯、滕垣等汉回绅士主持，向全省各府州厅县募银 51 万两，于当年六月落成，号舍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66 页，岳麓书社 1984 年出版。

^②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 267 页，岳麓书社 1984 年出版。

可容四千人。同年，左宗棠奏请简派考官，举行甘肃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与试者约三千人，比较以往赴陕西乡试的人数，多出两三倍。

甘肃贡院的创建，科举中额的扩大，改变了以往甘肃士子参加科举困难的局面，使甘肃士子之夙愿得以实现，堪称甘肃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在客观上激发了人们追求功名而研习文墨的积极性，其结果必然是学校的增加，入校人数的增加，迄清末，甘肃省府、州、县学科考、岁老试考额共 2661 名，廩生、增生的学额共 3292 人，^①促成了儒学的繁盛，推动了甘肃教育的发展。

办学离不开经费的后盾，甘肃府、州、县学是怎么样来维持其发展的呢？据《学粮德政碑》载：

国家定鼎以来，学校兴隆，圣朝 祭品诸大典无不举行者，良由□□□□，后屡经兵燹，继起者不得其人，只知私肥己罔恤学校废弛□□□□。卫侯为老父师莅任之初，躬谒圣庙，目击宫墙倾圯，祭品菲薄，□□□事令本堂现存□□□□，不忍肥己，当公诸学校，遂移文□□□□，共粮六十石，粟饩正额每名四季借支银钱□□□□，今每名各□□□□粮六石，文武宾兴每年积粮六石，文武科举盘费每年积粮五，□□□□，两设，现给粮二十四石，贫士现给粮二十二石，以上九项，每年□□□□，人材蔚起，倘有掇巍科而捷南宫者，何莫非我父师培植学校，仰奉圣天子崇隆之至意也，即继我父师而为治者，谅必与我父师□□□□，父师之罪人，实学校之罪魁耳。鸿等欣奉盛事，□愧雕龙。谨以□□□□，父师之丰功骏德，当与学校并垂 不朽云。^②

看得出，甘肃的府、州、县、卫学校均置有数额不定的学田，由地方官府筹拨和地方绅士、民众捐募，发商生息，作为其教育经费主要的来源，有的学校还以店铺租金作为教育经费来源。据（宣统）《甘肃新通志》载，“金县学田一顷七十四亩，征租一十石四斗四升，折银共一十两四钱四

^①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三一，《学校志·学额》。

^② 光绪《洮州厅志》卷十四，《金石·学粮德政碑》。

分”，“靖远县学田十顷，岁收租十二石”，凉州府“府学田原额三十八顷一十九亩二分，征粮一百四十七石七斗五升”。^①总的来说，甘肃府、州、县学的经费来源渠道还算不少，既有官学出资，也有绅民的大力支持，从而使得甘肃府、州、县学教育能继续发展。

在府、州、县学的管理方面，清朝政府制定了诸多条规来约束学生，在全国各地颁布训饬士子文，刻碑于各级学校，晓示生员。据《明伦堂卧碑（世祖章皇帝御制训饬士子卧碑文）》所载：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官卫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家人代告，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遇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为难，为师长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②

又据《圣祖仁皇帝御制训饬士子文》载：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国家建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兹特亲制训言，再加警饬尔诸生，其敬听之：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术事功，源委有序。尔诸生幼闻庭训，长列宫墙，朝夕诵读，宁无

^① 宣统《甘肃新通志》卷三十一，《学校志·学田》。

^② 光绪《洮州厅志》卷八，《学校下》。

讲究，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敦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穷经考业，勿杂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口雅，毋事浮华；轨度式于规绳，最防荡佚。……或唆拔奸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类，结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自兹以往，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学臣师长，皆有司铎之责者，并宜传集诸生多方董劝以副口怀，否则职业勿修，咎亦难口勿谓口言之不预也，尔多士尚敬听之哉。^①

道光三年（1823年）谕：“各省士习淳漓不一。其不守卧碑者固宜严办示惩，而安分读书者宜曲加体恤，以培士气。”^② 国家教育学生是为了培养顺民。府州县学与科举考试的关系越是密切，则其学校教育受科举考试的制约也就越大。一方面，教学与考试的主要内容，大都是四书文、五经文及试帖诗，使学校教育越来越脱离社会需要，而专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准备。另一方面，清代统治者以文取士，其规范文体即八股文，对于推进科举取士的规范化功不可没，但作为一般性的文体，是刻板而不足道的，箝制着学子的思想，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① 光绪《洮州厅志》卷八，《学校下》。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七，《学校考四·直省乡党之学》。

第三章 书院教育

一、甘肃书院的兴起、发展及其背景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形式的学校，有官立也有私立，一般分为省、府、厅、州等不同级别。书院起源于唐代官方的藏书、校书机构，“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身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①。宋朝以后，书院逐渐演变成为讲学、藏书、祭祀、考课的地方，具有了教育的功能。

到了清初，朝廷鉴于明季书院讲学结社、议论时政，认为书院教育不利统治，曾禁止开设书院。直到了雍正八年（1730年），“敕赐各省会书院帑金各一千两”^②，书院开禁才有了前征，这和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稳定，以及国家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有极大关系。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世宗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捻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③清廷从此改变了原来对书院的抑制政策。

建于明代成化年间的陇干书院，是见于史籍的甘肃最早的书院。清朝**书院开禁后**，雍正二年（1724年），甘肃巡抚卢询奉旨创立兰山书院，其后府、州、县陆续建立书院，甘肃书院渐趋兴盛。本文以《甘肃新通志》为底本加以统计：明清两代甘肃省共有书院110所，其中明代创建11所，清代创建93所，无考者6所（见表2）。

^① 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典礼类下·书院》。

^② 《清朝通志》卷七十四，《选举略三》。

^③ 《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学校考八》。